

STUDIA HISTORICA MONGOLICA

蒙古史研究

蒙古史研究

第二輯

中国蒙古史学会



蒙古史研究

第二辑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年·呼和浩特

本刊编辑部

编辑 陈育宁

留金锁

乌力吉图

责任编辑 乌力吉图

蒙古史研究

第二辑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0.25 字数：228千字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统一书号：11039·96 定价：1.35元

目 录

深切怀念翁独健先生	陈育宁(1)
-----------------	--------

· 论 文 ·

(1) 内蒙古古代史中的若干问题 (蒙文)	亦邻真(134)
(2) 木华黎厚待降将之初探	朱清泽 李鹏贵(5)
(3) 蒙古东征高丽概述	郝时远(15)
(4) 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	刘迎胜(21)
(5) 元泰定帝寿年证误	高文德(31)
(6) 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	贾洲杰(33)
(7) 喇嘛教与元代蒙古文化	汤晓芳(39)
(8) 河东延祚寺碑译释	蔡美彪(45)
(9) 《高丽史》中的蒙古语词“阿吉儿合蒙合” (英文)	[美]柯立夫(150)
(10) 土达原源	陶克涛(57)
(11) 喀尔喀五部考述	奥 登(69)
(12) 新疆察哈尔营、厄鲁特营概述	蔡家艺(79)

(13) 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 聿 一 之 (87)

· 史 料 ·

蒙古黄史 图 巴 著 (95)
乌力吉图 译

· 综 述 ·

《蒙古秘史》源流研究概述 甄 金 (119)

· 人 物 ·

翁 独 健 传 略 薄 音 湖 (127)

邵 循 正 传 略 周 清 澍 (129)

· 简 讯 ·

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 田 野 (132)

英文目录 (155)

蒙文目录 (157)

深切怀念翁独健先生

陈育宁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翁独健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翁先生直到去世前,担任着中国蒙古史学会名誉理事长的职务,一直在关心、指导着我国蒙古史研究事业。一九八五年十月,在他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不好的情况下,他是坐着轮椅,在北京的内蒙古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会”,并且作了重要讲话,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学会会议。他的逝世,使我们蒙古史学界失去了一位老前辈、老领导,分布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国蒙古史学会的各族会员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翁先生。在中国蒙古史学会的唁电中这样写着:“翁先生为开创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史研究事业,培养后人,辛劳毕生,功绩昭著,晚年又亲自创建中国蒙古史学会,为推动蒙古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翁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全体会员将继承翁老遗志,为开创我国蒙古史研究新局面继续努力。”

一九七九年八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和煦的春风也吹到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领域,在翁先生等许多专家、学者的积极倡议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市隆重举行。这是我国民族史研究事业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在这个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会员一致推举翁先生为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翁先生主持并领导这个全国性的群众学术组织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

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以后,在以翁先生为首的理事会的领导下,团结、联络国内各族蒙古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出版会刊和论文集,进行对外学术交往,为推动我国蒙古史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中国蒙古史学会已有会员173人,分布在全国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会员中有汉、蒙、藏、回、满、白等六个民族。从一九七九年八月到一九八四年十月,学会先后举行了五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提交讨论和交流的学术论文及专著近三百篇(部)。第一次至第四次会议的论文,选编成论文集,已公开出版三集。一九八五年九月又公开出版了会刊《蒙古史研究》第一辑。中国蒙古史学会所进行的一系列学术讨论和出版的学术著作,涉及到蒙古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内容广泛而丰富,不少课题都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些成果,反映了我国蒙古史研究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翁先生虽身有残疾,行动不便,近年来又疾病缠身,多次住院治疗,但他总是争取多参加一些学会的活动。学会举行的五次大型会议中,他参加了一九七九年八月的成立大会及同时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一九八一年八月,他又不辞辛劳,飞往乌鲁木齐参加了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同时邀请了日本、美国、联邦德国的八位蒙古史学者参加,是我国蒙古史研究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起点。翁先生亲自主持会议,并认真听取了各国学者关于他们开展蒙古

史研究的情况。借这个机会,他积极促使我国蒙古史学界与外国学者和研究机构建立学术联系。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蒙古史研究人员和这些国家的学者有了进一步的学术交流,进行学术互访,扩大交往渠道。现在,通过对外学术交往和学术情报工作的开展,过去那种对国外蒙古史研究闭塞和不了解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视野开阔了,也更加树立起我们的自信心。

一九八四年八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由翁先生主编的《蒙古族简史》审书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会议。在这次理事会上,根据协商的意见部分调整了学会工作班子成员。理事会议前,翁先生曾向当时的内蒙古党委副书记王铎同志提出,由于自己年龄和健康的原因,请求辞去理事长的职务,请内蒙领导同志考虑理事长的人选。中国蒙古史学会是全国性的群众学术团体,由于设在内蒙古,挂靠单位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内蒙古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活动的。当时,王铎同志和内蒙古党委领导同志商议,认为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还是请翁老这样德高望众的学界前辈继续担任理事长为好,或者再过渡一段,内蒙古的同志可以多作一些学会的具体工作。王铎同志向翁老转达了内蒙古党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后,翁老当即表示,作为一个党员,走到哪里也要听从党的安排。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学会理事会上,他表示遵从内蒙古党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再主持一段学会的工作。翁先生的这种精神,受到了内蒙古党委领导同志的称赞,也受到了理事们的敬重。

就是在这次审书会议期间,我向翁先生请示学会工作时,他谈到了蒙文史籍的整理问题,拿出了一份从北京带来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的《情况简报》(第123期),上面登载着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研究生乌兰同志写的《关于整理蒙文史籍的意见》。在这个意见里,乌兰同志既提出了蒙文史籍整理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落后于欧、美和日本,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是我国蒙古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提出蒙文史籍的整理,应当包括原文校勘、拉丁音写、译文、注释,以及索引、序(跋)等几项内容。翁先生认为乌兰同志的意见写得很好,是对蒙文史籍整理的科学态度和作法。根据翁先生的推荐,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的《蒙古学资料与情报》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上予以转载。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翁先生不仅一贯重视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而且特别注意支持青年学者的好的意见,推广他们好的作法。他把一个内蒙古的蒙古族研究生发表的书面意见,从北京随身带到内蒙,又推荐给内蒙从事蒙文文献整理研究的同志,这种培养和器重后辈的精神是感人至深的。我曾几次听到翁先生表扬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作法,说他们具有战略眼光,特别提到的是,他们培养人注重质量,而不是只追求数量。

从八四年八月,根据理事会的决议,我参予了学会的工作。此后,曾几次听到翁先生谈学会的建设问题。翁先生对于中国蒙古史学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会如何开展活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

他提出学会活动要注重实效,提高质量。全国性的学会,在一定时期举行大型的学术讨论会是必要的,但不能举行得太频繁。在八四年八月呼和浩特召开的理事会上,翁先生明确

提出来,学会今后可以多开些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人不一定很多,搞这个专题的同志来参加,讨论可以深入些。有些大会,是用开会的名胜地方吸引人,为了去参加,急就章凑一篇论文,质量很难保证,而且增大了开支,这种作法要改变。八月十八日晚,他在与我谈学会工作时也提到,学会组织学术讨论,可以搞小型、分片的专题座谈,提高效果,大型的会议顶多三年一次。我们在安排学会以后的活动中,就是按照这个意见来进行的。

他提出一定要办好一个体现我们水平的会刊。一九七九年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时就计划创办会刊《蒙古史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办起来。一九八四年八月召开的理事会上,翁先生再一次提出,一定要组织力量,办好一个体现我国蒙古史研究水平的会刊,应当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学会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个会刊也可以适当刊登国外学者的论文,以进行交流和比较。根据翁先生的提议,理事会责成我和乌力吉图等几位同志立即着手筹办会刊。在筹办的过程中,翁先生不仅亲自为会刊题写刊名,而且专门会见了八四年八月正在内蒙古进行学术访问的联邦德国著名蒙古学学家海西希教授,约请海西希为会刊撰写文章。在翁先生的积极支持下,经过乌力吉图等几位同志紧张而有效的努力,终于在一九八五年九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蒙古史研究》第一辑。这是目前国内所见到的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它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关注。翁先生在《发刊词》中说:“从此,学会有了一个发表论著,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切磋讨论的园地,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不仅全国各地的会员们接到自己的会刊感到高兴,国外的学者也予以了热情的称赞。正值第一辑会刊出版之际,日本蒙古史学者若松宽、森川哲雄在内蒙古访问,他们见到了这本会刊,而且其中还发表了他们的论文,高兴地向几位编辑同志说,只有在中国才能出版这样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刊物,这就表明,世界蒙古史研究的中心是在中国。还要附带提到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从一九八〇年创办了以介绍国外蒙古学研究情报和资料为主的内部刊物《资料与情报》,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份蒙古学学术情报刊物,颇受蒙古学界的欢迎,翁先生特别关注到这个刊物,认为它抓住学术情报这个环节,比较早地向国内介绍国外蒙古学研究的情况,办得很有特色。翁先生在北京住院的病床上,还接见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办刊物的同志,鼓励他们只要坚持办下去,就会有成绩的。从一九八三年起,这个刊物由原来的《资料与情报》改名为《蒙古学资料与情报》,更加突出了它的专业特点,翁先生亲自为之题写了刊名。

他还提出要组织一个年轻的、精干的、能为大家办事的学会工作班子。一九八五年十月,中国蒙古史学会在北京举行理事会议,其中一项内容是改选和调整学会工作班子。在酝酿的过程中,学会的同志们感到,近年来各种学会纷纷成立,虽然是群众学术团体,但也有增设机构、安排职务的趋势,这不利于学会活动的开展。翁先生主张,学会领导要简化,不要图形式,要重效果,要搞一个年轻的、精干的、能为大家办事的工作班子。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和蒙古史学界的老前辈,参加在理事会中,理事会是学会的领导机构,决定学会的主要活动;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则组成负责会务的工作班子。翁先生主持理事会,阐明了这个意见,得到了理事们的赞同。根据这个意见,改选和调整了学会工作班子,由蔡美彪同志担任理事长,其他几位较年轻的同志担任副理事长,翁先生担任了学会的名誉理事

长。工作班子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具体安排会务工作,提高了效率,改进了作风。在学会工作的建设上,翁先生一直比较注意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翁先生在主持学会工作的几年时间里,在多次讲话和发表的文章中都强调,我们搞蒙古史研究,首先要加强基本建设,这个基本建设,一个是资料,一个是人才。资料的建设,首先是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整理、校订和汉译;人才培养上,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这些意见,不仅是推动民族史研究的正确意见,也体现着翁先生对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深厚感情。

对于民族史研究的许多理论问题,翁先生近年来也发表了许多精辟而又重要的意见。翁先生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一词,是一种地域的文化的概念,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历代封建王朝划等号,尤其不能仅与汉族王朝划等号,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王朝,而且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和政权。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他认为从本质上看,表现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内聚力,各民族间互相吸收,互相依存,越来越接近,从而共同缔造与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关于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他认为,所有在今天中国版图内的各民族,都是大家庭的一员,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都应作为国家的内部矛盾来处理。但是,进行战争的敌对双方,仍有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翁先生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必须用民族平等的原则去分析、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对于有关两个以上民族的事件和人物,都应当用同一个标准进行衡量与评价。必须肯定各兄弟民族在开发和建设祖国特别是辽阔边疆的伟大功绩,发掘并研究少数民族对于祖国文化宝库的重要贡献,用以阐明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必须承认各兄弟民族人民通过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艰苦斗争,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应当承认汉族在历史上的主导作用^①。他的这些意见和观点,对于中国蒙古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和国内民族史的研究工作,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翁先生直到晚年,思想仍然闪烁着敏锐的火花,他在不断探索着中国民族史的发展规律,努力推进着我国民族史的研究工作。一九八五年十月,他在厦门召开的中国民族史学会首届学术讨论会的书面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从中国民族史的全局看,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存在着:北方游牧民族、南方农耕民族以及中原地区农业先进的汉族这样三条发展带,称之为发展形态或发展系统也可以。总之它们各自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终于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以及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上述想法,可不可以作为研究中国民族史的线索?并由此进行深入专题研究呢?”^②这是翁先生生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个课题,在这个课题里,凝聚着他对中国民族史研究不懈地追求,也倾注着他对我中国民族史研究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殷切希望。

(作者工作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①参见《论中国民族史》,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②《开展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几点希望》,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

木华黎厚待降将之初探

朱清泽 李鹏贵

一、升赏有功者

二、重用忠勇者

三、抚慰患难者

四、善纳降将建策

五、监视、谋杀不轨者

六、木华黎厚待降将之影响

蒙金战争（1211～1234年）期间，成吉思汗为了西征，于1219年从金国返回漠北，次年诏封蒙古军四杰之一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授权他全权指挥攻金战争，命他“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①。木华黎（1170～1223年），札剌儿部人，“多谋略，雄勇冠一时”②，随从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进攻金国，战功卓著。他按照成吉思汗的指令，“东征西讨，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决于己”③。在招纳豪杰、厚待降将方面也十分出色。对夺取攻金战争的胜利和确立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不仅在蒙古史上是一个创举，而且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我们考察了《元史》、《金史》、《元朝名臣事略》、《蒙兀儿史记》、《史集》和《圣武亲征录》等史籍所载木华黎麾下的六十余个归降将领之后，感到木华黎在厚待降将方面的成功，是很值得探讨的。

一、升赏有功者

木华黎对待归降的将领，始终贯彻了有功即赏、大功大赏、小功小赏、无功不赏的原则。就其实践的结果来看，大体有四种类型：

1、先复原职、领原军，尔后量功行赏。这里包含着对降将进行考察的过程，是真降还是假降？是有智有勇的战将还是滥竽充数的草包？经过一定时间的考察，确认是真降的战将，便予量功行赏。如，河北易州地主武装首领、金中都留守、行元帅事张柔，一二一八年八月率军在紫荆口外阻击蒙古军时，因马蹶被俘虏，他“立而不跪”，发誓“大丈夫死即死，终不

①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郑澧神道碑》。

②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

③赵珙：《蒙鞑备录·诸将功臣》。

偷生”①，木华黎见其忠勇，当即释绑，张柔受感动遂降，“未几复旧职”②。此后，他在攻金中屡立战功，克城三十余座，“辟地千余里”③。经过此番实际考察，次年，木华黎才任命张柔为荣禄大夫，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号拔都鲁。后来张柔升为万户，成为蒙古的一大“名臣”。河北藁城土豪董俊，一二一五年归降木华黎，当时无所授，直到一二一九年才“以劳擢知中山府事，佩金虎符”④；一二二〇年，木华黎因董俊击败金将武仙有功，授龙虎卫上将军、行元帅府事；后又因董俊的建议被采纳，而升授其为左副元帅，并“号其众为匡国军，事一委俊”⑤。金万户王玉，在木华黎下中原时归降，木华黎先令其“领本部军”⑥，后见他征战英勇，特别是在围攻潞州（今山西长治）时，左目中矢，仍带伤奋战，竟拔其城，故命其署元帅府监军。不久，金将武仙引诱王玉妻叛蒙投金，遭到拒绝，就杀害了其儿子，掘了王玉的祖坟。因此，王玉更加激愤，随从史天泽斩杀武仙属将四十三人，因功加定远将军、权真定五路万户。再如河北清乐军首领史秉直弟弟史怀德，在归降后，木华黎只是命他“就领其黑军隶帐下”⑦，直到第二年战死，尚未升授，但对其子史天倪却予以重赏、重用。

2、对来归影响巨大者，立即升赏。这方面以写入《元史·忠义传》的石硅较为典型。石硅，原为金境内“负险自保”的红袄军首领，后为南宋涟水忠义军统辖，一二一九年曾派亲信列顺到西域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慰劳列顺，并约定“永结一家”⑧。次年，宋军将石硅妻子沉死于淮河，石硅得知此讯毅然率列顺等人到燕北投奔木华黎。木华黎慰劳说：“汝不惮跋涉千里，慕义而来，寻当列奏，赐汝高爵，尔其勉之”⑨；并许诺“若得东平、南京（今河南开封），授汝判之”⑩。一二二一年，木华黎授石硅光禄大夫、济兗单三州兵马都总管、山东路行元帅，佩金虎符，还将此事报告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诏曰：“石硅弃妻子，提兵归顺，战胜攻取，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东平兵马都总管、山东诸路元帅”⑪。山东益都张琳，原为南宋京东安抚使，一二二一年主动远道来归，木华黎立即授其为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府事⑫。郭遵，主动以河北要地枣乡、蓨县归降，木华黎当即下令把县升为州，命郭遵为节度使、行元帅府事⑬。可见，木华黎当即重赏有巨大影响的降将，既表明他着意于分化瓦解敌军的策略之实行，也表明他追求豪杰的心情之迫切。

3、对成功卓著者，破格升赏。木华黎同成吉思汗一样，十分注重人的现实表现，而不甚计较其族属、出身和阅历。他一旦发现一个大忠大勇的降将，便给予加官晋级，破格升赏，契丹人移剌捏儿，曾拒受金朝封予的参议、留守等职，在蒙金战争之初，前来归降并献

①②《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

③《元史·张柔传》第347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⑤《元史·董俊传》第3491页。

⑥《元史·王玉传》第3567页。

⑦《元史·史天倪传》第3486页。

⑧⑩⑪《元史·忠义传》第4279页。

⑨⑫⑬《元史·木华黎传》第2933页。

十策，成吉思汗立刻升他为霸州元帅。一二一五年起，移剌捏儿辅佐木华黎征辽西，克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战功显赫，木华黎升授其为龙虎上将军、兵马都提统元帅；不久又将其取广宁等十五城之功驰报成吉思汗，给予佩金虎符的重赏^①；一二二二年，移剌捏儿从木华黎围攻陕西凤翔，率先登城，左臂中流矢，裹伤再战，连取两城，为此又升迁军民都鲁花赤、都提控元帅，兼兴胜府尹。史天祥，也是一个受到破格升赏的人物。其父史怀德降蒙后英勇战死，天祥袭职统帅黑军从木华黎克锦州，拔金州，取武平，缚金将巢元帅，击败金将武仙，继又下河东、河中等一百三十余城。木华黎上其功，赐金虎符，授予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之职，总十二万户，镇河中^②。还有一个受到破格升赏的是刘黑马，其父刘伯林，原为金威宁防城千户，一二一一年缒城归降成吉思汗，因功官至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刘黑马“骁勇有志略，年几弱冠，随父征伐，大小数百战，出入行阵，略无惧色”^③。刘伯林病卒后，木华黎命刘黑马袭父职，为万户，佩金虎符，兼都元帅。木华黎去世后，刘黑马在李鲁庵下征战，一二二五年在隘胡岭大战中斩杀金将忽察虎，击败金军四十万之众。一二二九年窝阔台开立三万户，便以刘黑马为首；一二三一年增至七万户，仍以刘黑马为首。当然，刘黑马两次被列为万户之首，不是木华黎的旨意。但也不能排除木华黎对他破格升赏形成的影响。

4、既升赏主将，又赏其属将。宋济南治中严实，于一二二〇年以八州三十万户归降木华黎，木华黎立即拜授严实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④。随同严实来归的部将刘通，经严实推荐，亦被授予齐河总管，接着又命为镇国上将军、左副都元帅、济南知府、德州总管、行军千户^⑤。严实的女婿张晋亨及其兄张颢，随严实来归后，木华黎先授张颢为安武军节度使；张颢为蒙古战死后，木华黎又命张晋亨袭兄爵。此后，张晋亨辅佐严实及其子严忠济，荣立许多军功政绩^⑥。还有一个叫齐荣显的人，是严实的外甥，时为“神童”，九岁代父任金千户。他从严实归降后，“屡立战功”^⑦，被晋升为权行军万户，官至东平路总管府参议，兼领博州防御使。总之，归降木华黎的主将及其属将，凡是忠勇者，在荣誉和爵位上均能各得其所。

二、重用忠勇者

木华黎对归降的将领，凡表现忠勇者，一面升赏，一面重用。升赏的要意在于提供一个“用武之地”，二者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下边侧重探讨木华黎重用忠勇降将的做法。

①《元史·移剌捏儿传》第3529页。

②《元史·史天祥传》第3488页。

③《元史·刘伯林传》第3516页。

④《元史·严实传》第3505页。

⑤《元史·刘通传》第3944页。

⑥《元史·张晋亨传》第3589—3590页。

⑦《元史·齐荣显传》第3601页。

1、量才录用，用其所长。这是木华黎使用忠勇降将的基本原则。在木华黎麾下凡是有真才实学者，大多得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如石天应，原是兴中府土豪，一二一五年举城归降木华黎后，“大小二百余战，常以身先士卒”；他又善于“造战攻之具，临机应变，捷出如神”①，累功迁右副元帅，后来木华黎又上表推荐其当了陕西河东路行台兵马都元帅。进军陕西时，还特命石天应在黄河上造舟楫、建浮桥济师。诸将都说，黄河“水涨波恶，恐劳费无功”②；但不多日，桥成，诸将心悦诚服。后当石天应战死的噩耗传来时，“木华黎闻而痛惜焉”③。又如史天祥，多谋善断，深受木华黎的器重，被视为左右手，根据木华黎的命令，蒙古军、汉军、黑军都听其节制④。再如，金北京留守何道忠之子何实，懂兵法，熟谙路，“通诸国译话，骁勇善骑射”⑤。归降后，木华黎与他议论兵事，见他言谈“奇变百出，拊髀欣跃，大加称赞”⑥，遂引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亲赐何实鞘剑一把，命其在木华黎军中充先锋，继又升为元帅左监军。木华黎去世后，李鲁继续重用何实，分给织匠五百户，专设课织局归其所辖。还有一个叫李邦瑞的，“幼嗜学，读书通大义”⑦，曾任金将小史。归降后，木华黎惜爱其才华，专备鞍马，送至行在所，“中书以其名闻”⑧，以后充任蒙古派往南宋的大使。一大批有胆有识的智勇降将，在木华黎提供的大舞台上大显身手。

2、赋予统军监督之重务。木华黎使用忠勇降将，不仅一般地使其有职有权，而且还不惜把一些要职赋予他们去承担。如，“万户”，原是蒙古的要职，在成吉思汗立国时只授予木华黎、博尔术、纳牙三人，后来“万户”之级位虽有降低，但仍是个重要军职。木华黎麾下降将获受万户衔者有：刘黑马、严实、张柔、史天泽、齐荣显、郾顺、王玉等人⑨。再如“达鲁花赤”，也是蒙古的重要官职，通常由蒙古人充任。木华黎麾下降将充任达鲁花赤者有石抹也先、赵瑁、查剌（也先之子）等人。此外，木华黎亲授监军重任者有：石天应（元帅右监军）、何实（元帅左监军）、石抹孛迭儿（左监军）、攸哈剌拔都（随营监察）等。

3、赋予坚守要地之重任。木华黎十分重视战略要地的作用。每当夺占一处要地，他总是慎重选择最信任的将领统兵驻守。一二二二年，木华黎夺占山西大片地区后，认为“全晋为要害之地，人心危疑未定，非（李）守贤镇抚之不可”⑩，便把善治善守的忠勇降将李守贤从锦州迁河南南路兵马总管。河东人知道后，争相传闻：“吾等可恃以生矣”⑪。是年十月，蒙古军占领河中府后，木华黎鉴于其战略地位“为河东要害”，是进军陕南、河南、四川的跳板和前进基地，便对善于守御的石天应说：“我择守者非君不可”⑫，即令石天应为河南北路陕西关西行台，并命

①②③《元史·石天应传》第3526—3528页。

④《元史·史天祥传》第3487页。

⑤⑥《元史·何实传》第3550—3552页。

⑦⑧《元史·李邦瑞传》第3620页。

⑨见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

⑩⑪《元史·李守贤传》第3547页。

⑫《元史·木华黎传》第2935页。

平阳守将李守忠、太原守将哈剌拔都、隍州守将田雄等均受石天应节制,体现了木华黎对这位有智有勇将领的高度信任。

4、赋予治理控制区之重托。木华黎和其他蒙古将领们,大多是不善于治理控制区的,故把这一艰难任务交给归降的汉将去承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王义,原是金宁晋县都统,归附后经木华黎同意去治理沂城渔业,改变了当地战乱所造成的田荒民饥的局面。此后,木华黎命其治理深、冀二州,王义“乃布教令,招集散亡,劝率种艺,深、冀之间,遂为乐土”^①。又如刘伯林,木华黎命其治理威宁,经十年经营,“务农积谷,与民休息”,终将威宁建成“乐土”^②。再如张柔,很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木华黎便充分发挥了他这方面的才能。李鲁襄职后,张柔移镇保州,安定居民,设置官署,引泉入城,疏通河渠,通商惠工,不数年使一个历经兵火、荒废十五年的保州,“遂致殷富”^③。类似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抚慰患难者

木华黎对忠勇降将,不仅重赏、重用,而且在他们遭到艰难险阻或遭受不幸时,又总是尽力慰抚,为其排忧解难。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王珣。他世为辽大族,本姓耶律氏,一二一五年率十余万遗民归降,木华黎命他为元帅,兼领义、川二州事。次年,木华黎率军围攻兴中府(今辽宁朝阳),王珣倾全力来援蒙古军,叛将张致乘王珣出征之际,夜袭义州,将其家人全部杀死。木华黎对他深表同情,留他在兴中,并遣其子王荣祖去面奏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闻报后说:“汝父子宣力我家,不意为张致所袭。归语汝父,善抚其军,自今以往,当忍耻蓄锐,俟逆党平,彼之族属、城邑、人民,一以付汝,吾不吝也。仍免徭赋五年,使汝父子世为大官”^④。事后,木华黎还把自己的部队交王珣指挥,攻占开义、锦州等地后,木华黎命将全部俘获交王珣处置,王珣杀了仇人张致,其余均予释放。一二一七年授王珣金紫光禄大夫、兵马都元帅,镇辽东,便宜行事,兼义、川等州节度使,因王珣貌黑,人称哈剌(黑之意)元帅。

木华黎对战死的降将,不忘其功,对其亲属加倍慰籍。常用的做法是:父死子袭,兄死弟继,官爵俸禄,代代相传。以史家父子为例,早在一二一三年,河北“清乐社”首领、永清地主史秉直,率众在涿州归降。木华黎原想启用史秉直统兵作战,但史秉直辞谢,而荐举其子史天倪。木华黎遂命史天倪为千户^⑤,命史秉直管领降人家属。此后,史天倪率清乐军,“从木华黎略地三关已南,至于东海,所过城邑皆下”^⑥。又随从攻略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因功授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一二二五年,史天倪遭武仙

①《元史·王义传》第3567页。

②《元史·刘伯林传》3516页。

③《元史·张柔传》第3473页。

④《元史·王珣传》第3535页。

⑤《元史·太祖纪》及《史天倪传》均误为“万户”。据钱大昕:《元史考异》,此时实授千户。屠寄:《蒙兀儿史记》也认定是千户。

⑥《元史·史天倪传》第3479、3481页。

杀害，留有二子，年纪尚幼。孛鲁便命其弟天泽袭兄职为都元帅，以后升为中书右丞相，成为蒙元的一大“名臣”①。一二四二年初，史天泽引史天倪长子史楫入见窝阔台汗，奏曰：“楫已成人，乞解职授之”②。窝阔台汗勉励：“今之争官者多，让官者少，卿此举殊可嘉尚。朕自有官与之”③。即命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佩金虎符。再如，石抹也先，一二一五年率黑军归降后，木华黎奏授镇国上将军、御史大夫，不久在攻懿州时战死。木华黎即令其子查剌袭职领军，还解锦衣赏之④。辽东川州守将刘世英，率宗族乡人隶木华黎麾下，累功授绛州节度使，兼行帅府事。不久，刘世英卒于军中；因无子，弟幼，木华黎就让其族兄刘德仁袭职。一二二六年刘德仁战死，孛鲁又命刘世英之弟刘亨安领其众，授镇国上将军、锦州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兼观察使⑤。这种世袭爵禄的制度，成吉思汗时只在蒙古内部采用，木华黎因袭这种制度于蒙古人以外。虽然这是一种易生弊端的落后的东西，但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木华黎这样做，对安慰战死者的亲属以及广大归降人员，并激励他们为蒙古效力，还是起了作用的。

四、善纳降将建策

木华黎善于采纳降将的献计献策，一方面表明他善于招贤纳士和勇于进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忠勇降将的信赖，不是把他们当作外人看待。

作战之前，木华黎重视采纳降将有关打击方向、攻击目标的建策。如一二一四年，金帝因畏惧蒙古军的进攻，迁都到南京（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下令再攻中都（今北京）。面对此种新形势，木华黎应怎样行动？当时，史天倪献策说：“金弃幽燕，迁都于汴，已失策矣。辽水东西诸郡，金之腹地也。我若得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境），以扼其喉襟，则金虽有辽阳，终不能保矣”⑥。石抹也先亦献策说：“东京（今辽宁辽阳）为金开基之地，荡其根本，中原传檄而定也。”⑦此后，木华黎按照天倪、也先的计策，率军在“开基”“腹心”之地辽河流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遣石抹也先计取东京，“不费一矢，得地千里、户十万八千、兵十万，资粮器械山积”⑧；继而挥军攻克大宁、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锦州、兴中府等地，摧毁了金国在东北的基地，切断了金国从东北方向救援中都的道路，确保了中都之战的胜利。

战斗过程中，木华黎注重采纳降将有关战略战术的建策。一二二〇年，木华黎率军攻打据守真定的武仙，命史天祥攻城。史天祥建议说：“攻之恐戮及无辜，不如先谕之。苟其不从，加兵未晚。”⑨木华黎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派他去见武仙，谕以祸福，武仙投降。这样，不费一兵一矢便夺取了重镇真定。在具体战法上，木华黎由于及时采纳降将所献计策，故能

①《元文类》卷五十八，《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②③④⑦《元史·史天倪传》第3481页，第3479页。

④《元史·石抹阿辛传》第3603页。

⑤《元史·刘亨安传》第3559页。

⑥《元史·石抹也先传》第3541页。

⑨《元史·史天祥传》第3487页。

吸取中原先进武器装备及汉军韬略。如适时用炮，造舟楫、架浮桥济军，骑兵步兵协同作战，以及部队衔枚潜进等，都获得显著成果。

战斗结束时，木华黎也十分重视采纳降将有关禁止屠城、杀降的建策。蒙金战争之初，木华黎是按照屠城、杀降的惯例行事的，给当地民众造成了灾难。后来，他所以改变了做法，注意实施招抚政策，同他虚心采纳降将的建策有着直接联系。一二一四年，木华黎率军在辽西连克十五城，惟大宁一城不下。史天祥以不杀降为诺言招降金将完颜胡速，木华黎欲杀之，史天祥劝止说：“杀一人无损于敌，适驱天下之人为吾敌也。且其降时尝许以不死，今杀之，无以取信于后，不若从而用之”^①。木华黎觉得史天祥言之有理，便命完颜胡速为千户。胡速为报不杀之恩，率领所部与蒙古军一起合攻大宁，立了战功。一二一五年，木华黎率军进攻北京，久攻不克，城破时，他下令屠城。当时在场的石抹也先劝阻说：“王师拯人水火，彼既降而复屠之，则未下者，人将死守，天下何时定乎！”^②木华黎当即下令赦之。一二一七年，木华黎率军攻冀州，金军闭门拒战，射杀蒙古大将石抹也先，木华黎大怒，城破后欲将屠城。赵瑄泣劝道：“母与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赎一城之命”^③。木华黎为其哀乞所动，遂下令免于杀戮。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直到一二一七年或更迟一些时间，木华黎尚没有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到禁屠城、止杀降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一次次地采纳了降将劝止的意见，才使百万计的民众免于涂炭。可是，到了一二二〇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年，木华黎进军山西，刘世英进言道：“自古建国，以民为本，今河东杀掠殆尽，异日我师复来，孰给转输？收存恤亡，此其时也”^④。后来史天倪建议说：“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钞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⑤木华黎诚恳地接受了刘、史二将的主张，下令：“敢有剽虏者，以军法从事。”^⑥可见，到这时，木华黎才真正懂得了屠城、杀掠的政策不仅极其不得人心，而且对己方的尔后行动亦极其不利，同时也与“弔民伐罪”的本意背道而驰。所以，从此其麾下军队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野蛮做法。

五、监视、诛杀不轨者

在某些降将来投之初，木华黎对他们是有戒心的，特别是对那些在兵临城下不得不降的人，更是不放心的。为此，他通常采取如下手段：

一是留人为质。如张柔被迫归降之初，“主帅恐公为变，质二亲于燕”^⑦。再如世为辽官

①《元史·史天祥传》第3486页。

②《元史·石抹也先传》第3542页。

③《元史·赵瑄传》第3554

④《元史·刘亨安传》第3559页。

⑤⑥《元史·史天倪传》第3480页。

⑦《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

的刘润，一二二〇年在邢州归降后，木华黎授官都统，其子刘秉忠十三岁“为质子于帅府”^①。后来，刘秉忠长成为一位深受忽必烈“大爱”的重要谋臣。

二是派遣监军。主要目的是监视、督察降将的行动，特别是督视其有否复叛的动向，以防不豫。另一方面也是让监军与其共同指挥军队，平分其权力。充当监军者，绝大多数是经过考验、足以信赖的智勇双全的降将。

三是诛杀谋图不轨者。如锦州张鲸，一二一四年聚众十万杀金节度使，以“临海郡王”身份归降木华黎。次年，木华黎密察其“有反侧意”^②，便派石抹也先监其军。张鲸在奉调南征途中，称疾逗留，复谋遁去。木华黎发觉后就令监军石抹也先将其执拿诛杀。再如吴天作，原为金平阳县公，一二二二年被其裨将蒲察定住、监军王和等人迫降木华黎，“受大元官爵，佩虎符”^③。但不久，吴天作在降金土豪张开、郭文振拉拢下，企图叛蒙投金。木华黎察其不轨，“恶其反覆，遂诛之”^④。在中原作战中，被木华黎诛杀的不轨降将是极个别的。由此看来，他诛杀不轨降将，也是作为扩大厚待降将影响的一种补充手段。

六、木华黎厚待降将之影响

木华黎厚待降将的举措，体现了“恩信结人”^⑤和“收存恤亡”^⑥之意，这同过去那种滥肆杀掠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比较得人心的，这不仅在当时对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蒙元国策的制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1、激励大批降将报恩效命。在木华黎的感召下，许多降附将领为报不杀之恩和升赏重用之爱，同时也为猎取更高地位，都积极为新主人效力，甚至不惜以生命表达自己的忠诚。如董俊，归降木华黎后，被录用为左副元帅，他不仅弃生忘死地奋战，而且还主动向木华黎揭发武仙归降后的表现，说：“武仙黯不可测，终不为我用，请备之。”^⑦木华黎采纳了这一建议，只命武仙为副职。后来果如其言，武仙杀了史天倪，叛投金国。董俊本人，后来战死在追击金帝的途中，年仅四十八岁。大宁义州人李守贤兄弟六人^⑧，更是誓死效忠的典型。他们归降木华黎后，都得到了升赏和重用。李守贤成了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阳县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积劳成疾，四十六岁卒。兄李庭植，官至右副元帅、崇义军节度使。从兄李伯通，随同木华黎在锦州作战中战死。从兄李伯温，行平阳县事，当平阳县被金军攻陷

①《元史·刘秉忠传》第3687页。

②《元史·木华黎传》第2931页。

③④《金史·胡天作传》第2588页。

⑤《元史·王珣传》第3535页。

⑥《元史·刘亨安传》第3559页。

⑦《元史·董俊传》第3491页。

⑧《元史·李守贤传》第3547页。